

市民城市之浮現？

● 夏鑄九

前 言

本文之主旨在於嘗試闡述戰後台灣城鄉關係變化中都市問題之特性。對此課題之研究有理論上的涵意，即對新興工業國「依賴都市化」特性之認識，既需避免與發展理論平行之主流都市研究的認識論障礙，又需躲避依賴理論之單純套用。過去的研究中，對都市化之觀點往往不自覺地將先進工業國之城市發展視為人類共通之自然史，以及，將開發中國家沒有經濟發展與工業化，而卻有嚴重之都市集中過程，稱為過度都市化。但是，像台灣這類開發中國家的具體情境卻是：有了經濟發展，也有了工業化，然而，都市之結構性問題卻並未隨經濟發展逐步解決，它們其實是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之結果。

為了進一步理解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伴隨之都市結構之矛盾與都市衝突，我們需要理論的角度以了解台灣的城市，揭露台灣城市與社會變遷間的關聯，認識空間結構轉化與都市意義被重新界定之機制。這也就是說，戰後台灣都市意義之賦與和再界定的社會過程，是不同的歷史行動者根據他們自己的價值與利益，結構台灣社會的基本過程之一(Castells, 1983: pp.301-303)。對這個關乎台灣社會—空間動力的社會過程（或者說，都市與區域過程）的分析涉及：在戰後國際分工中，為歷史與社會所界定的國家，如何對待經濟發展的過程，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動力所形成的特殊性又如何呈現在空間結構之中。因此，國家如何經由明確有形與隱而不顯的政策為中介，塑造空間的社會過程是問題的核心。

在動態的社會政治過程中，空間與社會有各種可能性，那麼，台灣城市與社會變遷的機制與趨勢何在？本文首先指出台灣都市問題的複雜性，研析混亂的都市形式上建構的投機城市，指出世界城市與非正式城市並存之趨勢。然

闡述戰後台灣城鄉關係變化中都市問題之特性，既需避免與發展理論平行之主流都市研究的認識論障礙，又需躲避依賴理論之單純套用。

後，由都市矛盾、都市政治之互動，指出台灣地域之危機，以及，由都市社會運動中浮現之另一種選擇：市民城市之建構及其弱點，以展望台灣城市與社會之未來。

台灣都市化過程中投機城市之建構

依賴都市化曾像依賴理論一般被教條地套用，忽略了都市實踐中國家的作用，忽略了地域社會特殊之動力，忽略了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

相對於發展理論與主流的都市研究言，依賴都市化曾像依賴理論一般被教條地套用，忽略了都市實踐中國家的作用，忽略了地域社會特殊之動力，忽略了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而這種種因素不但存在而且常發揮反擊依賴性的功能。其次，依賴性也有諸多不同類型，如殖民依賴、商業依賴、金融依賴、技術依賴、地緣政治依賴、文化依賴……等。形式主義的傾向導致理論不能針對歷史特殊性進行分析，因此不能分析具體之情境。然而，依賴都市化仍是一個有用的概念，可以將特定國家的都市化，連結上世界層次之經濟與政治系統的變動。所以，它可以將不同國家之間社會的不對稱關係傳譯為空間層次之語言。本文試圖表明，戰後台灣特殊的資本主義之發展中，經濟發展之成果是植基於都市問題的代價之上的。作者傾向於接受曼威·柯司特（Manual Castells）對台灣及亞洲新興工業國之分析，認為重要之經濟發展正是在戰後求生存之情境中民族國家建構或重建的計劃，是國家藉此突破依賴性的關鍵。因此，台灣確實並非地緣政治依賴關係中美國之依賴國家（dependent state），反而可類比於中世紀之屬國（vassal state），在完成了國際分工中之職能與貢獻之後，仍可具備國際關係中之相當程度之政策自主性（Castelle, 1991）。而本文所欲強調的是：國家之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社會間之互動，國家控制了社會，卻也動員了社會。台灣的城鄉關係就是在這個社會政治過程中建構的，它雖不宜以依賴都市化概念化約，然而卻同樣存留有依賴城市的結構性特徵。簡言之，這關係着國家之都市政策特性，關係着國家與社會的性質與互動。

戰後台灣特殊的資本主義依賴發展之歷史，造成了區域空間扭曲的模式。1950年代台灣城鄉關係中展現之都市形式，可說是疊壓在日據時期殖民依賴關係下之建構：殖民者軍事政治控制所界定的殖民城市，以及，農業資本主義化的殖民地縣。1950年代沿襲殖民城市制度架構之官僚城市，是在國際關係（地緣政治依賴）與苟且求存的政治危機下建構以及尋求突破的。官僚城市都市建構的社會過程，正是國家透過官僚壟斷資本與黨國機器之特權，以政治壓迫與收編地方精英雙管齊下，結構台灣社會的基本過程之一。前者，加深了國家在國際與國內政治的合法性危機；而後者，在城鄉關係上就不只是空間分工而已，它暗涵了政治上的對立，以及日後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對立。

1960年代之後，納入新國際分工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型，由於空間的分工，根本地改變了台灣既有的城鄉關係。一如亞洲新興工業國中之其他國家，台灣外銷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是在前述特殊的歷史危機中，藉以重建「民族國家」的社會與歷史計劃。計劃中潛藏的主體是國家，是國家的技術官僚。這個關係着台灣政治史與社會結構的「發展掛帥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1950年代沿襲殖民城市制度架構之官僚城市，是在國際關係（地緣政治依賴）與苟且求存的政治危機下建構以及尋求突破的。

經由一種特殊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以推動與維持發展的能力為其合法性之原則，不但控制了台灣社會，也動員了社會(Castells, 1991)。於是，戰後都市化之特殊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之模式，也就必須放在這個社會與政治過程中去理解。

(一) 地方自主性的喪失 城鄉移民逐漸升級的過程，確實是台灣都市集中之主因。農業因納入世界市場，利潤較高，卻造成不穩定，加上國家以農養工的低糧價政策，更鞏固了城鄉移民之模式。從1970年代起，農村剩餘的邊際勞動力，透過分包與代工成為外銷加工廠的非正式勞工，而另一方面，這些工廠也污染了農村環境。到了1980年代末，這些下游工廠又在國際市場之新台幣升值壓力下，遷出台灣。這趨勢目前仍在進行，它勢將再進一步強化台灣城鄉移民的模式。此外，農工差距表現為城鄉差距，也有以農業部門之國內市場取向的非正式經濟，做為自求生存的手段，如1980年代檳榔之產銷。簡言之，這種依賴都市化之不均衡發展的模式，重點並不在於所得差距(偏遠之山地與離島仍是)，而是地方自主性喪失的地域危機。

(二) 區域空間的失衡發展 城鄉移民所造成的都市集中趨勢，逐漸形成了過去台灣並不顯著的都市「首要化」與區域空間上的不平衡網絡。台北、高雄兩頭大，而地方型中小城市之功能減弱。其中，台北都會區所集中的人口已達全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台北都會區的支配性仍在擴大中(夏鑄九, 1988, 1991)。依賴都市化顯示的還不僅僅是人口分佈與經濟整合的問題。它其實說明的是社會關係的改變：都市集中的是財富、權力與服務。1980年代開始，台灣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被迫調整經濟結構，都市集中程度將因產業之淘汰與升級(技術依賴的程度卻更高)而更顯著。

依賴都市化顯示的還不僅僅是人口分佈與經濟整合的問題。它其實說明的是社會關係的改變：都市集中的是財富、權力與服務。



(三) 國際體系變動與世界化城市 台灣區域的不均衡發展，係依世界市場之變動連續改變空間組織之模式，而台灣本身卻難以控制。今天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過程中，所面臨的開放國內市場、新台幣升值等壓力，對原有外銷中小工廠的衝擊，將對國內區域空間結構的可能轉變產生重大影響。譬如說，都市進一步集中、首要城市進一步成為隨跨國公司與國家發展政策的脈動而變動的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y)(在這個時候，為台北市政府的信義計劃，引領着台北市東區崛起)，而城鄉差距、選擇性的發展，卻對比出原先即蓬勃的都市非正式部門進一步擴大。非正式城市(the informal city)與世界城市是連體之嬰，它關係着台灣非正式經濟的特色，以及，國家的角色。這是建構投機城市的重要機制，需要進一步交待。

(四) 非正式城市的建構 台灣在國際經濟架構中，就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與其社會資源，被視為：無彈性的國家導引着充滿了彈性之資本(Castells, 1991)，換句話說，推動經濟活動的主角是中小企業。台灣的中小資本及其勞工，以具活力進入世界市場，以製造業之簡單加工納入新國際分工，在這個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型中，國家對非正式經濟的無能管理、姑息與縱容，支配了台灣都市的基本形式：這是城市混亂與壓力的經驗^①，值得分為三點敘述：

政府對非正式經濟的無能管理、姑息與縱容，支配了台灣都市的基本形式。

(1)台灣當前一般市民日常生活中經驗的都市形式的混亂，關係着都市結構以及台灣的社會結構。首先，非正式經濟關乎勞動關係之非正式化。簡言之，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有了經濟活力，然而勞工卻未能享有制度化之財富。這些彈性、也有利可圖的非正式部門，經由家庭與分包代工網絡而與其他部門相連，納入世界之市場。它們不但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減少、轉向正式化，反而產生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組織。在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之間已建構



起一種強大的連繫。這種勞動關係的非正式化，部分是與社會的依賴性特徵有關。非正式部門關乎：1. 資本積累的過程，2. 有助於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3. 非正式經濟以特殊的方式維持了社會秩序，造成了都市形式的混亂，然而，它卻增加了台灣現實社會結構的複雜性。此處需要提及非正式部門，一般言，是經由「個人」的個體位置，而非「合約」方式，來推動人們求生存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非正式經濟增加社會弱勢團體動員的困難。

(2)其次，非正式化的勞動關係使得人們不能以正常薪資在市場中解決住宅與都市服務，也無法使人們有能力組織他們自己，給予壓力而得到公共部門提供的住宅與服務，所以，都市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成為台灣做為一個開發中地區保持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的基本機制之一。

(3)最後，非正式經濟的設施也造就了台灣都市生活環境的急劇惡化。短時間集中大量的人口也仍然使首要城市都市服務之消費不足，因為在服務方面，城市無法吸收這麼快的成長。提供設施的能力關乎經濟的發展，而缺乏政府之反應才使都市問題惡化。都市集中過程中，公共設施與都市服務卻未能跟上工業與經濟發展，這就是為何工業發展的時候，公共生活環境的品質與條件卻居然惡化的原因。

所以，對比於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家之技術官僚藉着新傳播技術得以在經濟國際化過程中將首要城市界定為世界城市，非正式城市之建構則為台灣之中小資本、勞工以及國家，分別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結構台灣依賴社會之社會政治過程。非正式城市建構中之國家角色，中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區分，推遲了而且模糊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所要求的公/私領域，讓人人都自以為是受益者。同時，國家之霸權(領導權)(hegemony)卻是靠「經濟發展：國民生產毛額之提高」來維持，提供權力集團實現利益分享與權力聯盟之導向。



投機城市之資本邏輯所表現的空間形式是「創造性的摧毀」，在歷史的某一時刻創造地景，而後又將其摧毀，以便為進一步的積累開路。

(五) 投機城市之資本邏輯 經濟發展霸權與都市集中過程所鼓動的房地產開發，建構了投機的城市。1980年代末，龐大外匯存底所造成的巨額貨幣供給，以及，新台幣緩慢升值，推動了各種類型的投機活動。投機活動擴大了台灣社會原來相對較不顯著的社會貧富差距，加強了社會兩極化之趨勢。土地投機活動越演越烈的結果，更加使得都市發展淪為一般市民無法控制的情境，甚至是在無從知曉的過程中，被看不見的力量所推動。民間壟斷性土地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結合國際壟斷資本在都市發展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改變了過去台灣城市的政治主導之父權性格。過去，台灣城市體現的是殖民城市與官僚城市背後共通的法西斯美學，而投機城市，是土地資本對都市化利潤之抽取，以及，商品美學的象徵表現。台灣城市中之公共空間遂淪為私人責任逃避之世界、私人之剩餘場所，以及私人所掠奪的對象（楊子葆，1991：7）。

投機城市之資本邏輯所表現的空間形式是「創造性的摧毀」(creative destruction)。由於國家未能有效控制土地投機者之暴利，沒有要求都市計劃應有的公平原則，反而將空間直接淪為資本積累商品。台灣城市都市形式之原有肌理被迅速地改變，夷平、拔除、破壞過去的資本投資成為必要的手段，重建超高層成為提供憧憬的都市地景(Harvey, 1975:12-13)。發展的霸權已經化身為都市本身的性質，被稱為現代性(modernity)，成為普同的、卻又與地域性文化相衝突的經驗方式。這種空間的現代性，其實是創造性摧毀的地景隱喻。這種為熊彼德視為企業家的英雄主義意象，其實是受積累的飢渴所催逼，在歷史的某一時刻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創造的地景，而後又將其摧毀，以便為進一步的積累開路(Harvey, 1986, 1989:17-18; Castells and Henderson, 1987:8)。套用馬歇爾·伯曼的話來說，這種現代性經驗在台灣的穿過程，透過國家的霸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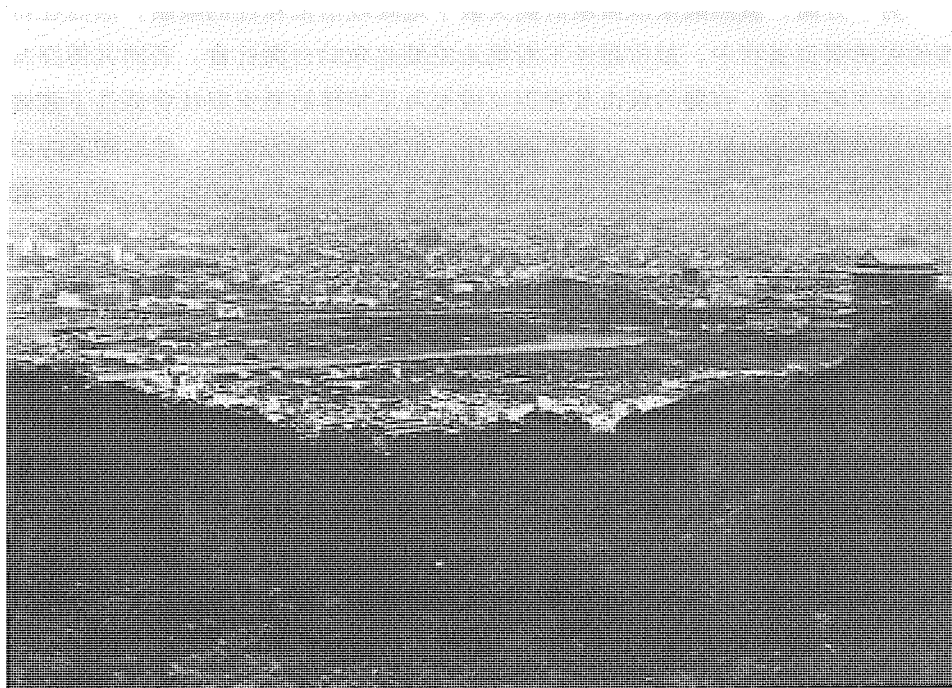


「應允了台灣社會冒險、歡樂、成長、轉變自己及世界——但同時又威脅着要摧毀我們所有的一切，所知的一切，所在的一切」(Berman, 1982:15)。現代性的經驗聯合了台灣所有人類，橫跨過不同的政黨、派系，創造與摧毀了台灣的城市與地景，成為人造的第二自然。以及，現代性空間的台灣版本是界定在世界城市之精緻與非正式城市之狂野並存共舞的社會過程之中。現代性的經驗確實威脅到台灣地方社會的一切，並曾在1970年代末，遭遇到民粹主義者鄉土意識的對抗，以及，迄今猶烈之保存運動之抵制(葉乃齊, 1989)。

總之，台灣都市形式之混亂，其實與台灣社會的結構緊密相關，表現了台灣都市與區域問題的多重向度性質。一如台灣的農業問題、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等，台灣的都市與區域問題已經成為台灣經濟成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了。台灣都市與區域問題的複雜面向與壓力，終於在國家權力結構調整與權力集團鬆動的時候，推動了都市社會運動，挑戰了國家的正當性。

草根民主的可能性

基於前述台灣依賴城市之結構性角色及都市與區域問題的多重向度特性，以下試圖指出，台灣社會在經歷了經濟發展過程之後，由市民、社區與自主性民間團體提出一套與制度化都市意義相矛盾的新都市意義之可能性及其目前之困境，這就是市民城市的建構。



作為中介的都市政策

前章所述台灣都市與區域問題之多重向度特性是否是開發中國家之資本主義依賴發展的必然性？其實並不一定。都市與區域矛盾之惡化是在社會與政治過程中建構的，這也就是說，台灣戰後都市與區域問題之多重向度特性關乎國家的都市政策之中介。在台灣，為歷史與社會所界定的國家，以其政策中介於跨國公司所支配的世界市場競爭與快速成長的城市所形成的都市與區域危機之間。所以，台灣的都市與區域計劃必須在世界的層次上應付眾多不確定的事物——它們來自經濟發展過程中處身新國際分工的情境，來自一個被國際權力所壓迫屈服下的公共機構與制度，來自它必須與地方權力集團折衝。這些都是重大的問題，然而規劃師可以運用的資源卻極有限。國家的都市政策在制度中長期也未受重視，嚴格說來，國家發展掛帥的霸權之下，只有經濟發展政策，都市政策中，規劃專業本身原有的意識形態也多因此遭受扭曲，規劃論述中源自十九世紀的烏托邦傳統之改革性制度，也多淪為殘補性質，因此，在先進資本主義都市的消費社會化趨勢方面，台灣雖有法令、有計劃，然而技術官僚卻無能力，亦無意願執行。一方面，常規性的都市與區域計劃，因其形式主義取向，對現實問題有如隔靴搔癢，造成計劃不良，都市服務落後。相較於前節所言之非正式經濟泛濫，在國家政策干預的角色上，中央政府可以說是以國家的合法性中介於政治活動之威權侍從（正式的）與地方派系（非正式的）關係中，以國家之正當性，以公共工程與公共空間品質的低劣做為政治利益妥協，換取政治聯盟之代價，因此，台灣生活環境急切惡化自不足為奇。

沒有市民的城市

另一方面，誠然國家以發展計劃突破了地緣政治依賴性的限制，然而在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被依賴性不對稱地組織起來的台灣社會，若將其傳譯為特殊的空間結構，台灣的城市其實仍可被視為是特殊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建構的依賴城市（dependent city）。依賴城市是一個沒有市民的城市，是對國家的意志、土地投機與外國資金變化的流動處於無可避免地屈從的情形下，居民對都市發展失去了社會性控制之歷史結果，依賴城市並不是指貧窮城市，或是有一般住宅危機的城市，而是指城市的空間是城市的居民所生產的，然而他們卻不像是城市空間的生產者，反而像是城市裏的臨時營造人員。在前節所提之非正式城市之脈絡中，這種未能正式化的城市居民，無法擁有城市，享用城市之歡愉，控制城市之成長（Castells, 1981b; 夏鑄九, 1990a）。由這個角度來看，過去台灣城市與地景的都市意義的變遷大多為結構性支配利益塑造了城市。由日據之殖民城市、1950年代之官僚城市與1970年代後浮現之投機城市、非正式城市，以至於1980年崛起之世界城市，其實主要是既定社會中之支配階級（除了非正式城市提供了關乎生產與流通領域中更複雜的圖象，包括了更多的階級與階級片斷之外），因為擁有制度性之權力，根據它們的利益與價值，而一再地再結構台灣的城市與區域，改變了既存的意義。但是，只要是資本主義城市的結構

台灣的都市與區域計劃必須在世界的層次上應付眾多不確定的事物——它們來自經濟發展過程中處身新國際分工的情境，來自一個被國際權力所壓迫屈服下的公共機構與制度，來自它必須與地方權力集團折衝。

台灣的城市是一個沒有市民的城市，是對國家的意志、土地投機與外國資金變化的流動處於無可避免地屈從的情形下，居民對都市發展失去了社會性控制之歷史結果。

方式持續下去，都市之抗爭與替代性的預期也可在城市空間形式與意義中被指認出來。

都市社會運動與都市意義重構

最近幾年，由於國家權力結構再調整與權力集團鬆動，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之初步動員，以不同的運動目標具體化了人們的利益和價值：

(1)居民長期對都市空間消費不足，或對生活環境急劇惡化抗議，這其實關係着居民要求將城市做為使用價值之目標，對比者將城市做為交換價值的現狀。像無住屋運動以住宅與房價做為訴求、迪化街保存運動等以古蹟、文化資產之保存為訴求，七號公園興建體育館之爭議，席捲台灣各地之環保運動……等。

(2)由於中央政策決策的單向與粗暴，各地方已不會再照單全收，這其實關係着居民要求地方的自明性與文化自主性目標，對比出技術官僚對資訊的壟斷，像宜蘭反六輕、蘭嶼反核廢場、嘉義新港反對拓變道路而破壞了城鎮的容貌等運動的潛在價值與主題都與此相關。

(3)以地域為基礎的自我管理期望，這其實關係着地方自主性、市民參與的要求，像原住民的運動、蘭嶼反核廢、以及宜蘭反六輕、台北縣反核四、甚至無住屋運動要求參與決策，自主造屋……等都與此目標有關。

由於台灣都市的快速成長、都市服務落後，以及都市問題的複雜面向，使得國家已經不再容易單純地以一種中央集權的方式，來經理都市生產、交換與消費等巨大過程，即，一個越複雜的體系，也越需要彈性與調適性，也就越需依靠分散化的決策與權力來解決問題，這就是民主化的分權。其次，在全世界，都市危機都會加重國家所需的正當性之危機。於是，經由都市服務而改善居民之生活，國家對都市服務之經理角色也日重，於是，國家與社會，國家與一般居民之間就浮現了一種新形式的政治關係，這也就是開發中國家的市民參與可能性。市民參與所代表的草根民主原來是第三世界的依賴社會難以奢望的國家與社會間的新政治關係(Castells, 1981; 夏鑄九, 1989a)，但是，在都市與區域問題的多重向度性的催動之下，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經由都市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反而提供了新的機會，重新塑造國家的都市政策，也重新界定都市之意義。對台灣言，這種空間與社會的新歷史關係就是市民社會與市民城市之浮現——十八世紀末之歐洲政治思想提出社會的觀念，因為，這時的歐洲政治，統治已不只是處理一個領土、區域、和其子民，而必需處理一個有自我法則、反應機制之複雜而獨立的現實。這新現實就是市民社會，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空間的改變(Rabinow and Foucault, 1982)，而這些原是第三世界依賴社會所無由提供的歷史條件。這些條件可能由都市社會運動突破。都市社會運動在新的社會變遷趨勢中可能可以提供都市意義重構所需的胚胎。

在都市與區域問題的多重向度性的催動之下，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經由都市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反而提供了新的機會，重新塑造都市政策，也重新界定都市之意義。

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之草根民主計劃

都市社會運動與國家都市政策的關係其實改變了政治學的理論，在武裝革

都市社會運動與國家都市政策的關係其實改變了政治學的理論，在武裝革命與形式民主之間開闢了另一種可能的出路，這是經由一條漸進的、緩慢的過程轉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命與形式民主之間開闢了另一種可能的出路，這是經由一條漸進的、緩慢的過程轉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個過程經由三個條件來進行，（1）台灣政治系統的民主化過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形成民主的進程至少已取得了地方選舉的開放；（2）都市與區域問題的複雜面向迫使國家檢討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推動了進一步分權的民主化過程；以及，（3）社會更完全地，更高程度地再組織與團結起來。民間團體要具備更高的自律與自主性。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在這個意思上，產生了較具自主能力的社會。衡諸目前之現實，我們可以說：台灣市民社會相對而言已經萌芽，都市社會運動會催動它的成長。這也就是說，假如台灣的市民不能控制國家，不能影響政策的決策過程的話，即使是國家的政治民主了，而市民們仍不能改變都市政策之決策，我們就還是依賴城市，就還是沒有市民的城市(a city of citizen)。都市社會運動對國家之轉化過程中，都市社會運動因都市危機而動員，在政府體制之外保持其自主性，經由民主的制度機制要求政府，而政府則經由都市改善滿足都市運動，應付都市危機。這裏，市民參與在政府運動之間扮演了一種在政府體制之內，而又在體制之外的機制。市民參與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它由都市社會運動中萌芽而組織起來，參與在國家的決策過程之中，卻又不參與在國家的體制之內。這種草根民主，以漸進的過程釋放社會的力量，經由民主的過程，改變了國家(Castells, 1989)。這也就是說，都市社會運動在改變國家都市政策的過程中，經由市民參與的機制，轉化了國家，也使社會得以成熟(夏鑄九, 1991a)。

社會尚未成熟的特殊歷史時勢

即使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與都市與區域問題的複雜面向使得做為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也居然有了嚮往草根民主的可能性，然而，前述之第三點，台灣市民社會的壯大才是決定性的關鍵。相對於由東方專制主義之歷史與第三世界依賴發展下的威權國家之政治結構言，近年來開始萌芽的台灣市民社會，即使是面對無能的公共政策與粗暴的公共營建決策過程，也仍然缺少在國家權力監護之外的自主性組織力量。在儒家式大家長的父權支配下，市民社會解放所需的自律性與自主性形成尚有待努力。譬如說，台灣的教育界、司法界(更不必提軍、警部門了)等等，由於政治結構的原因，長期成為一個封閉的再生產體系，其存在的作用就是維持政經制度之運轉，因此成為一個腐敗的部門，難以滋生自主性的力量，改革也不易穿透。台灣的市民呈現了活力，然而卻在現實活動中扭曲，還需更能為共同利益而集結，爭取發言的過程。對於台灣的城市居民言，參與，仍然是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參與，誠然仍是台灣的地方做為第三世界依賴社會之依賴城市的奢望，大尺度空間品質之改善與獲致，似乎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的幻景。就社會運動與國家政策改變之間的關係，以及草根動員的自主性與國家體制之收編吸納間的矛盾，我們必須面對台灣社會相對尚未成熟的特殊歷史時勢。

市民社會成長之阻礙

針對父權國家之支配性，或許，部分地方政府在公共領域中的都市與社會改革目標與草根團體動員之間關係之突破，可以是台灣社會與歷史變遷過程中得以施力之機制(張景森, 1990; 夏鑄九, 1991b)。但是，這種地域性的計劃卻首先需面對地方勢力之挑戰。在台灣，執政黨是一種半列寧式政黨的組織，與庸俗的資本主義式政黨的利益分享形成政治聯盟的雙重產物，所以，鄉鎮長及代表長期成為執政黨地方權力集團之樁腳，而草根社區的力量始終無法呈現其面貌。這是台灣的反對黨、地方政府、社區民衆、被壓迫群體與社會運動的挑戰。這是歷史的挑戰。台灣的社會，做為一種依賴社會，必需同時面對政治上海峽兩岸關係互動之挑戰、國際與國內的正當性危機、父權國家公共決策過程中的家長式心態與處罰不服從社會的手段、與政治權力重組過程中派系政治之鬥爭、經濟上國際經濟之競爭與強制壓制與潛存的階級矛盾、以及都市與區域之危機、文化上基本價值體系之崩解，它為金錢之利益關係所腐蝕……所有的這一些都集中在同一時間浮現，因此，一方面社會運動的訴求不容易突顯共同的利害關係，社會群體也就不容它辨認其自身，反而容易形成脫離現實結構性限制條件的，道德純粹性的訴求。另一方面，由於問題同時湧現，危機迅速形成，挑戰了國家，然而，社會卻因此得不到足夠的機會與時間以建構市民社會。這是台灣市民社會成長之阻礙，而這也是都市社會運動與新的都市意義由底層提出之時刻。

針對父權國家之支配性，或許，部分地方政府在公共領域中的都市與社會改革目標與草根團體動員之關係之突破，可以是台灣社會與歷史變遷過程中得以施力之機制。

結 論

台灣的社會當然不是市民社會，台灣的城市也還不是市民城市，可是，台灣都市議題的多重性卻正提供了大有可為的戰場，台灣的市民社會還需要都市社會運動提昇其自主程度，而地方政府也是一個着力點(夏鑄九, 1991d)。今後的地方政府已不僅是較清廉、縣長較勤奮即可保證再當選的，台灣的城市需要清楚的分析以揭露城市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以及，需要具體的方案與策略，以推動都市之實踐。都市的改革其實是社會的改革，當改革無望的時候，危機與運動將會推動更深刻的社會與歷史的轉化。

都市的改革其實是社會的改革，當改革無望的時候，危機與運動將會推動更深刻的社會與歷史的轉化。

註釋

① 此處使用之非正式經濟的概念借自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與亞歷山卓·波提斯(Alejandro Portes)(Castells and Portes, 1989)，而非世界銀行之學者們。近年對非正式部門的研究多改向用「小商品生產」或「小資本主義生產」來更精確地反映在資本邏輯中原先被界定為非正式部門活動的從屬性的與被控

制的性質。然而，由於用熟了的原因，老的「非正式部門」的術語仍然被廣泛使用。此外，更由於小商品生產的概念未能涵蓋政治層次的國家干預，它不宜取代非正式部門的概念。無論如何，使用非正式部門的觀點需要經過認識論上的處理，必需看到國家中介的過程。換句話說，正式部門是制度的 (institutional)，而非正式部門卻是非制度之內的 (non-institutional)，兩者相互矛盾卻是相互結合而存在的。這概念建立在對世界銀行觀點之批判上，提供了連結國家、經濟與社會等層次的概念建構。

參考文獻(中文部分)

- ① 夏鑄九，1988：〈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二、三期，夏、秋季號，頁263-337。
- ② 夏鑄九，1990a：〈都市過程、都市政策和參與性的都市設計制度〉《建築學報》，第一期，3月，頁137-152。
- ③ 夏鑄九，1990b：〈全球經濟結構過程中的台灣區域空間結構變遷〉《國土規劃的挑戰》，頁55-96。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④ 夏鑄九，1990c：〈國家建設六年計劃應與民間社會對話〉《自立晚報》，12月31日。
- ⑤ 夏鑄九，1991a：〈都市問題〉《台灣的社會問題》，楊國樞、葉啟政主編。台北：巨流(即將出版)。
- ⑥ 夏鑄九，1991b：〈都市保存：義大利波隆拿的經驗〉《漢聲》(即將出版)。
- ⑦ 夏鑄九，1991c：〈科技社群之自主性與社會角色〉《科技報導》，No. 109，1月25日，頁24。
- ⑧ 夏鑄九，1991d：〈台灣的地方政府與都市政策〉《全國民間經濟會議》，民主進步黨主辦，2月23日。
- ⑨ 張景森，1990：〈地方政府、民眾組織與地方計劃：九〇年代規劃的政治經濟學〉《國土規劃的挑戰》，頁159-176。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⑩ 〈區域及地方發展專輯〉《空間》，No. 16，11月號，1990。
- ⑪ 葉乃齊，1989：〈古蹟保存論述之形成：光復後台灣古蹟保存運動〉，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 ⑫ 楊子葆，1991：〈交通安全年的期望〉，(上)(下)，《交通與工業》，No. 3，4，頁4-9，4-7。

參考文獻(英文部分)

- ① Berman, Marshall,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 ② Castells, Manuel, 1981a. "Local Government, Urban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Zeitlin", Manuce 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pp. 1-19.
- ③ Castells, Manuel, 1981b.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lanning and the State o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④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⑤ Castells, Manuel, 1989. "Urba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Urban Policy in the Current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 A Seminar on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New Stage, at Taipei, Taiwan,

by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an. 11.

⑥ Castells, Manuel, 1991.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ichard Appelbaum and Jeff Henderson (eds.),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acific Ri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forthcoming).

⑦ Castells, Manuel, and Jeffrey Henderson, 1987. "Techno-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cio-political Process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Henderson, Jeffrey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⑧ Castells, Manuel, and Alexandro Portes, 1989. "World Underneath: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Portes, Alejandro, and Manuel Castells, Lauren A. Benton (eds.),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Press), pp. 11-37.

夏鑄九 1947年生，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現任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台灣社會研究》編委。著有“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Theories on Architecture: Toward a Social Theory on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全球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的台灣區域空間結構變遷〉、〈台灣的地方政府與都市政策〉、〈台灣的文化編入與脫落：依賴城市都市象徵之初步研究〉等論文多篇。